

# 二十年後

陈方正

讀者中當有不少看過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的名著《俠隱記》(*The Three Musketeers*)，知道少年英雄達太安 (d'Artagnan) 和他那三位劍俠朋友的大名和熱鬧事蹟。此書續集《二十年後》(*Twenty Years After*) 的開頭頗令人感慨：達太安奉路易十四 (Louis XIV) 之命尋訪舊友，邀請出山。他以為昔日同袍辭官後散處江湖，蟄伏鄉曲，一定頹唐疏懶，潦倒不堪，欣然應命不在話下。孰料這幾位奇才異士或祖業豐厚，或營生有術，二十年來逍遙自在，享盡人間清福，遠勝他這日夕佇候差遣的官兵多矣。到頭來，只有粗人頗士斯 (Porthos) 雀躍就道，高潔的亞島士 (Athos) 和深藏不露的亞拉米 (Aramis) 則不為所動<sup>①</sup>。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更何況是二十年？

如今離開創辦《二十一世紀》的日子，也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天昏地暗，風雨飄搖之際我們說：「在本世紀，中國人心裏曾多次燃起希望的火炬，可是，暴風雨中它並不能持久，一次又一次晃動、閃爍，終告熄滅。」二十年一晃過去，中國卻忽然間好像被解除了魔咒，從百年沉睡中蘇醒過來。現在全世界都看到，它已經富足、強大起來，重新成為舉足輕重的巨人，一個半世紀的夢想頓然成真了，希望的火炬再沒有熄滅。這翻天覆地，猶如魔幻的鉅變，不但在當時，即使在大約十年前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之際，都還是難以想像，不可思議。它來臨之迅速和突然，遠遠超過所有人的預期和希望。當年我們這樣闡述創辦此刊物的理想：

近百年間，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波折重重，其中原因固然很多，有關於本質和主觀意志的，也有取決於機緣或客觀條件的，不一而足。但總的來說，建立新文化的決心和努力不足，恐怕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們這樣說，絕對不是忽視科技、管理、醫學等專業知識，和工業、交通、運輸、城市建設等等物質條件，更不是認為，現代化可以憑藉抽象觀念來實現。然而，把現代化的努力局限於實用的層次，以現代化的具體表徵……來代替它的思想、觀念，那恐怕也是錯誤的。

因此，我們斷言：「必須等到傳統思想模式轉化成新觀念、新心態之後，現代化才能夠穩定和持續地在中國進行」<sup>②</sup>。這番話今日重讀，不免令人感觸萬端。讀者恐怕會生疑惑，我們也禁不住反躬自問：中國的鉅變真和我們所提出來的文化建設有甚麼關係嗎？

也許，回答可以從一個近來在朋友間經常引起熱烈爭論的問題開始，那就是：「造成中國近十年經濟飛躍發展的主要因素到底是甚麼？」有人認為這得力於中國深厚傳統文化的薰陶，有人覺得是由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提供了穩定環境和長遠政策，也有人指出全球化浪潮帶來難得的機遇，更有人深信改革開放政策是關鍵。這許多不同見解各有理據，各有飽學之士支持，因此在傾談、辯論中總是眾議紛紜，莫衷一是，誰也否定不了以上任何一種看法。那麼，平心而論，答案恐怕就在於因緣際會，所有這些因素的互相配合與補足，亦即它們缺一不可了。

倘若這想法不無道理，那麼無可否認，自1980年代以來，文化氛圍的轉變和改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這體現於兩方面：首先，是長期被壓制於國人意識底層的傳統文化，以及五四時期出現的新文化，都得以復蘇和重新發揮作用，那也就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改革開放政策，它通過出洋留學、培訓、考察，以及引進資金、企業、人才等多種方式，輸入了大量新觀念、新思想，它們在原有文化的基礎上迅速被吸收、融合，為社會注入新生命，也為它的轉型和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在過去二十年間，這兩個方向的文化建設（其中相當部分其實是重建）為中國培養了數千百萬不乏傳統素養亦具現代意識、觀念的人才，從而支撐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套一句老話，這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吧。

在上述大轉變中，我們不知道《二十一世紀》究竟發揮了甚麼作用，作出了多少貢獻。我們力求此刊物內容豐富、多元、新穎、具原創性，極力維持大膽自由風格，而在創辦之初，它也的確備受矚目，鼓勵和培養了相當一批年青學者成長，也激發了不少相類學術刊物出現。但畢竟它周期長、篇幅少，發行渠道不暢，更何況如今學術競爭日趨劇烈，學者被迫以專業為尚，像本刊這類思想文化雜誌自不免顯得非所急需。所以，這二十年來它所發揮的整體作用固然有待後世公評，但看來和當初的期望恐怕是有點距離了。當然，時移世易，以我們微薄的力量來說，這變化與距離毋寧是意料中事，不足為怪，亦不足為病。在今日我們需要反省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今日中國已經突飛猛進，踏上現代化道路了。那麼，它真的還需要像《二十一世紀》這樣一本批判性、思想性刊物嗎？



的確，即使從文化建設的角度來看，當前大部分國人所急切需要的，恐怕已非社會批判和思想評論，而是知識性、實用性、消閒性或者文學、財經、專業等類刊物，以在他們緊張工作和應付日常事務之餘提供具體和實用資訊為目的者（至於紙媒正在迅速為電子屏幕所替代而飽受威脅這事實我們姑置不論）。現代化這部大機器已經在中國卯足了勁轟轟烈烈地開動起來，它的當務之急是補充燃料，添加冷凝劑、潤滑劑，調整動力，校正方向，那些不在駕駛室裏面的人，只要安安靜靜各守本分，或者欣賞窗外風景就好了，否則七嘴八舌，徒然添亂而已。這種看法可能很普遍，表面上也不無道理，但不是我們所能夠同意的，這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原因。

在最切近的層次來說，這部大機器真的能夠照目前這個樣子一直開下去，而不需要重新設計和改進嗎？誠然，在過去二十年間，現行的高度集權體制好像運作順利，很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但也不容否認，到今日它已經問題叢生，亟需改革。這不但在野批評者多番論證，即使在上領導者也都一再公開提到了。政治改革的實際問題千頭萬緒，不可能在此討論，但改革何以必須，目前的集權體制，也就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或者「一元領導制」有何根本問題，卻是需要澄清的。至今為止，呼籲政治改革者大多從基本人權或者民主潮流等西方政治理念出發，這在改革開放之初容或頗有號召力，但在冷戰結束，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之後，則已經是褪色光環。更何況，通過普選產生的「民主制度」有許多不同形態，包括日本一黨（其實是一個政治聯盟）獨大，柄政數十年的形態，或者新加坡、俄羅斯那樣由選舉產生的威權體制；至於在此制度下極端失敗，不足為訓的例子，諸如當年一度被吹捧為「亞洲明星」的菲律賓，或者中北美洲動亂頻仍的許多國家，更比比皆是。因此，在意識形態驅動下進行政治改革是很危險的：蘇聯的改革導致國家解體，那解放了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卻在俄國本土造成空前災難，正可謂殷鑒不遠。

那麼，今日中國亟需政治改革的原因到底何在呢？也許，應該考慮以下看法：現代化可以從精英領導階層開始，卻不可能由他們完成；它的動力必須逐步但穩定地，從少數精英擴展到全體民眾，這樣方才能夠長期持續，而不致導致社會衝突、分裂、動蕩和逆轉。無論就制度抑或實際運作而言，中國目前的政治權力都是太集中，太一元化了，因此也就會阻止、扼制現代化動力的擴散。我們從前以俄為師，現在不妨以俄為鑒。從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開始，俄國就大力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在強有力一元化領導和幾乎不受外力干預的理想狀況下，積極向西歐學習，而且獲得極大成功，數十年間即躍居歐洲列強；此後從卡特琳娜大帝 (Catherine I) 以至尼古拉斯二世 (Nicholas II) 和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此國策一直未曾改變。然而，兩個世紀的現代化努力至終帶來的，卻是帝俄的崩潰，亦即徹底的失敗。為甚麼？用史家拉伊夫 (Marc Raeff) 的話來說，因為真正的現代化必須是自發的、連鎖反應式的社會蛻變，是社會本身規範的建立和意志的表現。因此，是不能夠從外部加以領導和控制的，無論領導者多麼開明、睿智、有遠見。俄國君主改革計劃的致命傷即在於：「它是

基於一個靜態世界觀，這是對現代世界本質的錯誤判斷，因為它忽視了現代化過程所釋放出來的動態力量」<sup>③</sup>。在此之後，蘇聯再一次崩潰和失敗，那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樣錯誤所導致的同樣結果。

當然，今日中國和帝俄與蘇聯有根本差別：它的現代化的確已經牽涉全國、全民眾，的確已經接近於「自發的、連鎖反應式的社會蛻變」了，其巨大成功之秘密正在於此。可是，中國今日的變革也還遠遠說不上是全社會「本身規範的建立和意志的表現」，它的政治體制也仍然是靜態的，是由少數精英階層所領導和控制的，他們即使「開明、睿智、有遠見」，至終也不免阻礙甚至扼制日益迅速和猛烈的社會自發蛻變，這是由客觀的制度結構所決定，而不是個人意志所能轉移的。在今日中國，弱勢群體和社會公義問題正日益惡化而難以調解，那正就是上述衝突的表徵。我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是當務之急，不應該再拖延下去，理由即在於此。但以中國這麼龐大和複雜的一個國家（有人說是整一個文明），要如何改革才可以將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逐步分散，而仍然保持良好秩序和共同目標，仍然發揮共同力量？那就千頭萬緒，不能不付諸詳細和深入討論了。我們認為像《二十一世紀》這樣一本思想性雜誌在今後仍然有其存在價值，最迫切的理由就在於此。

然而，政治改革雖然重要，卻也還不是最重要；在現代化競賽中落伍固然可悲，也還不是最可悲。對於一個國家、民族而言，最可怕、最可悲者，是在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方向，乃至迷失自己，也就是喪失獨立、冷靜思考的能力，或者由於貪婪、野心、短視、執迷而選擇錯誤方向，無法自拔。在近代，由於這樣的迷失而貽誤國家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之久者史不乏書。例如西班牙本來是歐洲海外拓展的先鋒，但從十八世紀開始的兩個多世紀，卻長期處於紛亂、沒落、受侮之中，其根源便遠在十六世紀腓力二世 (Philip II) 之宗教狂熱與窮兵黷武。法國在十七世紀末各方面都遠遠領先歐洲，但由於路易十四執意改變宗教寬容的國策，又好大喜功，連年征伐，與全歐洲為敵，以致在十八世紀就落後於英國，此後再也無法迎頭趕上。至於在當代，則納粹之於德、意，軍國主義之於日本，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之於中國，其所造成的深創鉅痛都是眾所周知，毋庸細表的。凡此種種，固然與政治相關，但也有賴容其滋長發芽的文化土壤，因此不是可以完全歸咎於君王、領袖、狂熱份子，或者一黨一派的。那也就是說，迷失往往從民族整體開始，是它受了富強所導致的狂妄自大或者貧弱所引發的狂躁憤恨之刺激，偏激情緒因而日積月累，至終表現於實際政治，從而將國家推向深淵。

中國今日能夠日漸脫離貧困自然值得額手稱慶，不過那是虛心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大體上有先行者的軌轍可循。但今後應當如何利用累積中的財富和力量，如何選擇前途，則再無成規可依，必須自行思慮籌劃了。此中理由很簡單：環顧世界當今各國，它們在幅員、人口、整體力量上與中國相若的只有美、蘇、德、日、印度等，但它們各有顯著弱點，堪為發展楷模的只有美國。事實上，毋庸諱言，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也的確以美為師而獲得極大成功。但今

後這仍然是可依循的坦途嗎？那恐怕有很大疑問。當然，美國富甲天下，它的大學、研究機構、工業體制，以至科技與學術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為舉世所效法、學習，那毋庸置疑。真正的，而往往為人忽略的核心問題在於：它所凝聚的巨大力量到底是用來做甚麼的？在過去十年間，這大致用幾個家喻戶曉的名稱就可以充分說明：導致全世界動蕩不安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導致金融海嘯的高盛 (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貝爾斯登 (Bear Stearns) 等「巨無霸」投資銀行，以及其通過「違約風險證券化」的瘋狂掠奪行為；也許，還應該加上兩個數字：軍費開支達到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囚犯數目佔全國人口0.75%，遠遠高出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因此，我們不能不問：美國仍然是世人歷來心目中那個自由、平等、開明、奮發、和樂的社會嗎？還是已經為財富與權力沖昏頭腦，逐漸遺忘它開國以來的那些美德與基本價值，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轉向霸道、貪婪、粗劣了？倘若如日中天的美國正在迷失自己，那麼中國又當如何知雄守雌，和光同塵，以待天下之自定呢？這我想沒有甚麼人能夠提供答案，但人人都有一己之見，一得之明可以貢獻。以是，像《二十一世紀》這樣的刊物，當還有更深一層的存在意義。

大仲馬的故事最後結局頗為悲涼：四位劍客有的鬱鬱以終，有的拒捕喪生，有的流亡海外，獨剩達太安官至大元帥，但儔侶風流雲散，萬丈豪情銷磨殆盡，在路易十四鐵腕統治下，英雄時代就此結束。我們的故事結局正好相反。《二十一世紀》是在低迷黯淡，風雨如晦的年代誕生。轉瞬二十年過去，我們驚奇地發現，忽然間一切都已經改變，都已經明亮起來。中國現在所需要的，可能是和以前不同的、屬於另一個階段的文化建設了。但時代雖變，這本刊物的價值仍然存在；我們當初創辦此刊的幾個朋友年紀容或大了，後繼亦不乏年青有為之士，所以它的生命力依然旺盛。我們期待，在下一個二十年過去的時刻，《二十一世紀》將會迎來真正現代化的中國。

### 註釋

① 此書前半部分在1930年代有曾孟浦譯，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本子，共三冊：《俠隱記》、《續俠隱記》、《二十年後》，文筆極洗煉通暢；至於後半部分 *The Vicomte de Bragelonne*、*Louise de la Valliere* 與 *The Man in the Iron Mask* 的中譯本則為三卷本的《布拉熱洛納子爵》，但筆者只見過英譯本。

② 見陳方正：〈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年10月號(創刊號)，頁4-5。

③ 陳方正：《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陳方正論文自選集，1984-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頁149。所引的拉伊夫原文，見 Marc Raeff, *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0，作者譯文。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